

*

论周馥的治水思想

汪志国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周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治水专家。曾主持治理永定河、金钟河、北运河、潮白河、大清河等直隶河道和山东黄河,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治水思想体系,他认为治水应先治水政之种种弊端,注重调查研究,讲求科学治水,顺水之性,以水治水,他的治水思想在我国水利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关键词】周馥 治水思想 以水治水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4)02-0085-04

A Discussion on Zhou Fu's Thought on Water Conservancy

WANG Zhi-gu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 Zhou Fu is a well-known water conservancy expert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He ever presided over the regulation of watercourses including those in the province of Zhili, such as the Yongding River, the Jinzhong River, the North Canal, the Chaobai River, the Daqing River and the Yellow River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years' practice helped him form his individual water conservancy thought. He insisted that the preconditions of harnessing the river are to reform those problems in water policy, to lay emphasis 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o approach the problem from a scientific way, and to harness the river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its nature. Zhou Fu's thought on water conservancy is a rather significant page in Chinese water conservancy history.

Key words : Zhou Fu; the thought on Water Conservancy; to harness the river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its nature

在中国几千年发展历程中,水灾一直是对中华民族威胁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治理水患也就成为历代统治者想做而又难做的一篇大文章。身为晚清封疆大吏的周馥(1837—1921,今安徽东至县人),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中,与水务结下了不解之缘,曾主持治理永定河、金钟河、北运河、潮白河、大清河等直隶河道和山东黄河,不仅治水成效显著,惠及灾区百姓,而且提出了系统的治水方案,形成独特的治水理论。对于前者,笔者曾著文予以梳理剖析。本文拟对后者,即周馥的治水思想体系进行粗略探讨。

一、治水应先治水政之弊端

水政为清代荦荦之大政,随着清朝社会政治的衰落腐朽,水政也迅速敝坏,其中东河水政尤为败坏。水政管理体制失灵、水政官员玩忽职守、侵帑自肥,治水资金短缺、物料稀少,这些弊端成为黄河屡屡溃决的重要原因和治理水患的主要障碍。周馥以为要治理好水患,必须先解决好水政的诸多弊端,只有这样,才能“一穷变通久之道”。^{[1] (卷5, P4553)}

* [收稿日期] 2003-10-10

[作者简介] 汪志国(1963—),男,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在职博士生,安徽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主任、副教授。

(一)改革水政管理体制。为了加强对全国水务的管理,1730年满清政府设北河总督、东河总督、南河总督,分别督理直隶、山东河南、江南的水利。此外,还在河督下增设各道厅,康熙初年,东河只4厅,南河则6厅,道光朝增至东河15厅,南河22厅,其文武河员均为专职。这种管理体制在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河流走势的变化,其弊端逐渐显现。由于管理线路过长,加之河员与地方官员存在矛盾,每遇河水盛涨,“催夫购料,呼应不灵”,^{[2]卷五 P280}一些有识之士疾呼改河图治。

周馥力主改革此种形同虚设、运转不灵、效率低下的水政管理体制。在1898年撰写的《代李文忠公勘筹山东黄河会议大治办法折》和《代李文忠拟筹议山东河工救急治标办法折》两道奏折,就提出了设立厅讯、堡夫,建立完善的护堤组织系统的管理方案。1902年8月,升任山东巡抚之后,周馥遂将上述主张进一步发展,把原由营委管理的水务变为两岸各州县兼管。山东黄河的防汛事务原由上、中、下三游总办督率,营委分段办理,但是随着下游河床泥沙淤积淤高,险情徒增,原设营委已穷于应付,周馥将黄河南北两岸21个州县原营委管理的水务,“一律改为兼河之缺,归三游总办节制调度。”周馥还赏罚分明,对治理得力的州县予以奖励,对治理贻误的州县予以惩处。与此同时,周馥考虑到沿河州县“各有应办地方事件,尚恐照料难周”,^{[2]卷2 P283}还把各州县原设的同通佐贰等缺改为“捕河之缺”,均归三游总办调遣节制,或近驻同城,或分防各镇,“专司修防弹压等事”,^{[2]卷2 P283-284}这些同通佐贰等原是管理漕运督捕押运等事,现因漕粮停运,终年无事,几同虚设。周馥此举可有三得,在公家“则禄不虚糜,而于吏治河防两有裨益”,^{[2]卷2 P284}通过上述改革,山东黄河水务管理的效率有了很大提高,黄河大堤防洪御险能力明显增强。“十年以来,鲸波息警,其御灾捍患,为闾阎谋久安”。^{[3]P27}

(二)整饬水政吏治。近代水政废驰,水务官员玩忽职守,竟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水务官员任修防,定地驻扎,本应定期赴河务工段往来巡查,但实际并不驻工。周馥对这种现象予以抨击,历来水务各官“从不出门一步,不知工段险要在何处,更不知河工修防为何事。虚糜俸饷,实堪痛恨”。对于这些玩忽职守之官,他主张或严肃处理,或裁拆淘汰,“以期稍挽颓风”。^{[2]卷1 P201-202}

水政腐败另一表现则是水官侵帑自肥,中饱私囊,周馥称之为“河工一蠹”。^{[1]卷5 P4600}以永定河为例,修筑堤工之举弊端甚多,以国家惠养百姓之金钱饱贪官污吏奸混豪强之欲壑,“或胥役侵渔,或土混包揽,或昏庸之吏限于不知,或不肖之员从中染指,且有夫头扣克之弊,处处皆然。即如挑浚河道一事,民夫例得银八分者,则公然扣除二分,应做土一丈者,则暗中增加二尺,或分就工程用夫一千名者,实在止有八九百人”。如此种种,实属可恶,“万不能容矣”,^{[1]卷5 P4601}应认真稽查,严肃惩处。

二、注重调查研究,讲求科学治水

囿于书本,拘于陈例,是治水之大忌。周馥对哪种拘泥于书本、不重视调查研究的治水官员深恶痛绝,他认为治水是“专门之学”,^{[2]卷5 P663}不仅要重视吸纳前人治水的成功做法,更应注重实地勘察,躬督亲试,调查研究,“非细心讲求,躬亲阅历,不能得其奥窍”。^{[2]卷5 P663}周馥治水调查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3种:

(一)实地勘察。周馥在直隶任职的20年间,遍历直隶河道,亲赴永定河、金钟河、北运河、潮白河、大清河、滹沱河等勘察水势,考察河堤,筑堤建坝。1874年,在筹划治理北运河时,他“单骑履勘漫水所趋之路”,^{[4]卷2 P989}探寻治水之方。在河水暴涨、河堤漫决之时,周馥又亲自上堤指挥堵筑决口。1877年,周馥在治理滹沱河时,曾前往河堤“步步勘量”、“详细履勘,测量多日,博访勤搜”,^{[5]卷1 P755-757}终于发现滹沱河不能分水南行。1890年,永定河漫决,周馥率员前往河堤及漫口处连日察看河水情形,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先堵合决口,再在北岸建石堤以护京师”的治理方案,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周馥不仅在治理直隶河道时,亲赴河工现场,调查研究,而且在治理黄河时,也是身体力行,而不是纸上谈兵。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河水自江苏徐州、淮阳等地注入黄海,改由山东利津、垦利

流入渤海,致使山东境内水患频繁。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力主挽黄河复徐淮故道,而东河总督乔松年则坚持在张秋立闸引黄河水入运河,廷臣众说纷纭,举棋不定。周馥认为只有实地勘查以后才能决定,遂于1873年3月乘船由天津大沽海口出发,赴山东、河南黄河一带察看,并写下了令“中外翕然无异词”^{[1]序,P3681}的《代李文忠公拟筹议黄运两河折》,主张让黄河下游河道保持现状,周馥注重调查研究的治水精神终于为争论一时的“挽复淮徐故道”之议划上了休止符。“以百日之劳,一牍之力,不动声色,造福无穷。”^{[1]序,P3682}1898年,周馥拟定的《代李文忠公勘筹山东黄河会议大治办法折》和《代李文忠公拟筹议山东河工救急治标办法折》两道奏折,就是在对山东黄河进行为期3个月的全面勘察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这两道奏折中,周馥提出了翔实的治黄方案,为以后的治黄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寻访乡农。沿河流域的广大乡农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水文知识和治水经验,因此,此类乡农就成了周馥治水调查的重要对象。1874年,周馥在北运河两岸堤防考察时,就向当地乡农与绅士寻问治水“免患之方”^{[4]卷2,P990}即在相距半里的南北两堤之中,在南开一条宽数丈的沟,以其土筑南堤,在北开一条宽数丈的沟,以其土筑北堤,挖河筑堤所占之地除粮给价,河滩容水之地免粮,这种方案使得“四十余年之水患”^{[4]卷2,P990}得以消解。1898年在整治黄河海口时,周馥提出了规复铁门关故道的大胆设想。该设想就是在接受当地渔民的建议之后而提出的。当时黄河入海口先后有铁门关、韩家堰、丝网口3处,周馥实地勘察后仍举棋不定,后询问当地老渔户时,渔民建议规复铁门关故道,既可蓄水攻沙,又可使船舶通行。

(三)向先人调查问计。周馥治水时常常用历史调查的方法,检阅各省河工成案、治河各书及文集说部,从中学习前人的治水经验。但周馥治水又不拘泥于古人,“是为古法而不废今制,即以今制济古法之穷。”^{[3]P29}周馥提出的“以人治水,不若以水治水”^{[5]卷1,P746}的主张,就是在吸纳明代治水专家潘季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而提出来的。1904年,周馥在利津县薄庄治理黄河时,就借鉴和吸取汉代贾让“徒当水卫之民,让地于水”的方法和清代靳辅的“治河之道当损小以图大,毋保全一方而误全局”的思想,采取了“不事堵塞,以畅尾闾,是为因形便迁,其土著载之高地”^{[3]P29}的方法。

周馥治水不仅重视调查研究,而且还讲究科学方法,注重将当时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治水。采用科学方法测量水位、岸高,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如1898年周馥在对上到曹州府,下到利津县的黄河逐段察看时,就带领了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详细测量,结果发现河面宽度不一,两堤相距五、六里至八、九里不等,鉴此情形,遂制订了对两岸堤防加高培厚的治水方案。此外,周馥还提出在沿岸架设电线,以便及时传递信息,还计划在河工险要工段内修建小铁路以便取土运料。

三、顺水之性,以水治水

从人类对水性的认识和对治水的感悟来看,治水之策有4个要素,即审地势、识水性、酌工程、权利害。周馥认为,在这4个要素中,“尤以水势顺逆为要”^{[2]卷5,P555}因为“大凡顺水之性,事半功倍;逆水之性,多劳无成。”^{[1]卷1,P3851}人们根据水性的规律和水势的变化来治水,不仅是人类治水本身的需要,而且也是“天地自然之大利也”^{[1]卷1,P3798}。

周馥重视对水性变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但并不否认人类本身在治水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水性虽顺,而不防其决、疏其滞,亦难持久也。”周馥还回顾了历代著名的治水工程:春秋时孙叔敖修建的芍陂、战国西门豹修建的漳水十二渠灌溉工程、蜀太守李冰主持兴建的都江堰工程,均是“事半功倍”;吴王夫差开凿的沟通长江和淮水的邗沟人工运河、魏惠王开挖的以开封为中心的人工运河鸿沟、曹操引淇水入白沟等则是“顺水性而以人力持久者也”;汉武帝穿漕通渭、建钳卢陂、穿漆沮溉临晋,则“用力多而难持久者也”。隋唐以后的引水工程大多是拂逆水性,如金元时期开卢沟、金口、击胶莱河等,虽竭人力而没有成功,惟开会通河诸工程,虽不大逆水性,然以人力调剂于盈缩之间,终获成功。通过对历史上引水万方数据

工程“顺水性”和“用人力”二者关系的梳理，周馥发现：“水性就下而亦喜直恶曲，引水之举用清易用浊难，南行易北行难、渠口就山易就土堤难、引河口有吸川之势则易无则难，尾闾建瓴直下兴正河同低则吸引较易高则吸引不畅”，进而得出结论：“习河务者，能谙水性、精测算，专以顺水性为主，而不强水以就人意”^{[1] 卷1，P3851}。

周馥还将顺水性治水提高到民本的高度去认识，他认为：“从来治水所以为民，然总以顺水性为主”^{[2] 卷5，P633}，而逆水性，不仅“徒糜工费”，耗费无益之财，而且会“救民而终莫能救”^{[2] 卷2，P336}，使百姓的利益受到更大程度的损害。所以，只有尊重水性变化发展的规律，顺水性治水，才能更好地保护百姓生命和财产之安全。

周馥不仅对顺水性治水的重要性进行全面深刻的阐释，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治水方案，即以水治水。就黄河而言，其难治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沙，黄河水流浑浊，挟带大量泥沙，如若水流稍为缓慢，泥沙就会沉下淤塞，使河床淤浅，洪水一到，势必造成决溢泛滥。所以，治理黄河必须着眼于泥沙。怎样治沙呢？周馥吸取历史上治理浊河的经验，“考古人治浊流之法，惟有坚筑堤防，束水攻沙之策”^{[5] 卷1，P745-746}，尤其是借鉴了潘季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成功做法，把加固黄河两岸大堤看成是“河防的根本要图”^{[2] 卷5，P656}，“必不可缓之工”^{[2] 卷5，P676}。由于两岸大堤险情不同，其加固方案也有所差异，“险工加顶宽四丈五丈，平工顶宽三丈，底宽以十一丈至十五丈为率，高以一丈六尺至二丈为率”。这样“险工得以有恃无恐，即平工段内，河滩渐渐淤高，尚有高出丈许之堤，可御漫水，日久雨淋风揭，不致遽见损坏”^{[2] 卷1，P655-656}。两岸大堤加高培厚，使黄河河水不旁溢，“则水由地中，沙随水去”，加大黄河正河的泄水能力，以减少洪水决溢的次数，从而获得“大培两岸堤身，以资修守而垂久远”^{[2] 卷5，P656}之功效。

周馥是中国近代不可多得治水专家，时人盛赞曰：“其功德在民，尤以河工为最巨”^{[3] P118}。他的治水思想一方面源于其治水实践，另一方面与历代治水理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周馥1871年随李鸿章到天津，当时直隶夏秋间久雨不晴，“永定河、海河、南北运河、草仓河及拒马河先后漫溢，畿辅东南几成泽国，造成数十年未有之水灾”^{[6] P301-302}。李鸿章派周馥参与治水，自此，周馥便踏上了20余年的治水征程，无论官位变异，职位升迁，都未停此过对河道水患的治理。治水时，他注重调查研究，而不纸上谈兵；他勤于思考，勇于创新，而不拘于陈例，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治水思想体系。同时，周馥还十分重视学习借鉴前人治水的成功做法，他一边治水，一边寻阅古籍文献中的治水资料，“日视工作，夜阅编籍”^{[1] 序，P3685}，“自江南以至山东、河南、直隶水利之书，无不搜购殆尽”，并“择其可为法戒者录之”^{[1] 序，P3680}，撰成《治水述要》10卷和《河防杂著》1卷，目的在于“示人治水之法”。被后人誉为“旧籍之功臣，后学之导师”^{[1] 序，P3680}。周馥的治水思想丰富了我国的治水经验，在我国水利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参 考 文 献]

- [1] 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治水述要[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
- [2] 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奏稿[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
- [3] 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卷首[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
- [4] 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玉山文集[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
- [5] 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公牘[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
- [6]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陈少华]